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牟宗三

学术思想评传

颜炳罡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0101518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

颜炳罡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颜炳罡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戴 逸主编)

ISBN 7-5013-1503-5

I. 牟… II. 颜… III. 牟宗三-评传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376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名 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

Mou zongsan xueshu sixiang pingzhuan

著者 颜炳罡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503-5/B·85

定价 20.00 元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 20 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 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 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 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

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 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 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 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 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的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

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导 言

1994年12月14日，一代大哲牟宗三因病住进台大医院，同月25日，其门人蔡仁厚、王邦雄等前往探视，牟宗三在医院病房索纸笔写下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一代都有成，我很高兴。

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无中年运，不能飞黄腾达，事业成功。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

现在得了这种老病，无办法。人总是要老的，一点力气也无有。

你们必须努力，把中外学术主流讲明，融和起来。我作的融和，康德尚作不到。

次年4月12日，牟先生于台北做古，这段话成为其学术生命的最终遗言。在这段学术遗嘱中，牟宗三向后学传达了四层意义：一、肯定后进学者的学术成就；二、总结了自己一生奋斗的得失；三、说明了自己当时的病情；四、对后进学者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其他三点暂且不论，这里仅就第二点谈点看法。

1995年4月12日，牟宗三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19日，蔡仁厚教授以《一生著作古今无两》为题将这段话作为牟宗三先生的病中垂语公布天下。蔡仁厚先生编《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时，复将这段话正式收入牟先生的学思年谱中。“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聊聊数语，病中的牟宗三说的轻轻松松，但对整个学术界而言，其气势之大犹如雷霆万钧，席卷一切，横扫一切。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牟宗三在中国学术界地位

究竟是否“古今无两”，蔡仁厚教授认为牟宗三先生“古今无两”如理如实，并作了六点说明：（一）他认为牟宗三对“儒、道、佛”三教之义理系统，分别以专书作通盘之表述，是古今第一人。（二）牟先生所著新外王三书（《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治与治道》），是真能贯彻晚明顾、黄、王三大儒之心愿遗志，而开出外王事功之新途径者。自古迄今，亦不作第二人想。（三）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牟先生乃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其对三大批判之消化，此古今译书者所未能也。（四）牟先生对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亦达到前所未有之精透，并持续从事基本之讲论与疏导。（五）对中国哲学所蕴涵之问题，进行全面而通贯之抉发与讨论，使中国哲学得以进入世界哲学之林。此项工作，亦未见其匹。（六）牟先生于北大毕业之前，写成周易哲学书稿至85岁而出版汉译康德第三批判下册，正式著书之岁月逾一甲子，此亦古今稀有者也。^① 蔡教授是牟门高足，长期以来，以诠释、弘扬、光大师说而不懈工作，他的说明自有谛当处，也很有代表性。

刘述先教授也感牟先生“古今无两”一语的份量非同常可，以《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的专文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他认为牟宗三先生对自己一辈子所作的了解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误解与夸张。他列举了三点理由加以说明：（一）牟宗三立论石破天惊，扫除宋明理学迷雾。他认为牟先生对中国哲学阐释，“梳理文献、阐明义理、指点体证；成就实不作第二人想”。尤其是牟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其“功力之深，古今的确没见到第二人。”指出朱子是“别子为宗”，立论直可石破天惊，扫除宋明理学七八百年来未解之迷雾。（二）牟宗三以玄奘译经的心情完成康

① 蔡仁厚《一生著作古今无两》一文 台湾中央日报 1995年4月19日和《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0—91页，前文指出前五点，编入年谱时，蔡教授又补入第六点。

德三大批判。(三)牟宗三在圣学传统中自有定位可超过而不可绕过。他认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地位正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相当,你可超过康德,但不可以绕过康德。牟宗三“是把中国哲学由主观体验转变成为客观学问的关键性的人物。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确‘古今无两’”^①。刘教授特别指出牟宗三在圣学的地位犹如位居五品的智者大师在佛学中的地位。不过这一说法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②刘教授主要从圣学的阐明与创发,学统的开拓方面解释牟宗三“古今无两”的意义,本人认为这一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也符合牟宗三先生话语的原意。

如何理解牟宗三先生病中垂语,是关系如何评价牟宗三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的大问题,也是研究牟宗三必须面对的问题。蔡仁厚教授、刘述先教授的理解固然都是出自对牟宗三学问的长期体认与浸润,都是忠实之言,也足以发人深思,但都显得简略。我们认为理解牟宗三的“古今无两”一语有两点应当注意:(一)不能离开牟宗三的著作去另寻“古今无两”。因为“古今无两”一语是专就著书而言。如果另寻古今无两,即使找到了也不符合牟宗三本人的原意。(二)理解牟宗三著述的“古今无两”不能从量的方面理解,只能从质的方面理解。所谓古今无两并不是说牟宗三学问涉及的面最广,也不是说他一生著述给后人留下的文字最多,而是说他的著述,思想之深刻,见解之透辟,意境之高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是说他的著述涉及到哪,就在哪里建立起一块自己的学术界碑。

这里想通过牟宗三的几十部学术专著所显豁出的精辟见解,看一看牟宗三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成就是否为“古今无两”。当然,

① 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见《牟宗三先生纪念集》第493—198页，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12月。

② 藩朝阳《追忆吾师牟宗三先生》，同上书。

真正理解牟宗三必须通读其全部论著,方能得到最为可靠的结论。

一、抛开一切,一心向学,自然生命的延续全部化为哲学生命的展开,可谓“肉身成道”。

牟宗三以其三十多部学术专著向世人表明:他的一生是向人类智慧的极顶不断奋进的一生,也是为人类理性奋斗的一生。他从中学走向西学,复由西学走向中学,最后融合中西,重铸中国哲学,形构中国文化,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人的理想追求。他得最大特点在于:无论其思想发展至何种阶段他就在何种层次立下一块永恒的界碑。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这是他在易学与中国纯粹哲学即玄学方面所留下一块界碑。他的第二部专书《逻辑典范》,是当时逻辑学界最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全书三大卷,六百余页,这是他在逻辑学领域树下的一块界碑。他的第三部著作《认识心之批判》,是书之作意在顺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重建主体哲学。这部著作从构思到完成长达十年,是书的完成使他真正获得了在哲学领域说话的权利。它尚未出版贺麟就在《当代中国哲学》中予以介绍,足见它在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地位。《逻辑典范》、《认识心之批判》及后出版的《理则学》可以理解为牟宗三进入于西学阶段的成果。五十年代,他出版了“新外王”三书,即《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由认识主体向上翻升进到道德主体。自六十年代以后,牟宗三全力从事中国哲学的疏理和阐释工作。《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名家与荀子》等是其中的代表作。这几部著作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全新阶段。七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牟先生出版了《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真善美分别说与合一说》,融合中西,超越中西,重建中国哲学。如果说由中学进入到西学,复由西学进入到中学,最后融合中西,重建中国哲学是近代学人普遍的学术取向的话,那么谁在这一学术取向上走到底,谁对这一历史使命完

成得最好呢？显然为牟宗三。从逻辑领域进入到哲学领域，复由哲学认识论进入到道德主体的挺立，最后由道德的形上学走向圆善与圆教，步步审视，层层升进。每一次转进都有其不可不转的必然性，都意味着对自我思想的超越，意味着不断向人类理性的极顶超越。完全可以说牟宗三的思考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由自为走向自觉的缩影，他的思想发展本身就是一不断走向圆满的哲学体系，就是一部不断向世人展开的哲学大书。近代以来，中国多故，政局动荡不安，使许多人难以将自己的学术信念坚持到底，政局的发展往往不允许你坚守自己的学术操守，这为许多身通中西且有学术抱负、学术创造力的学者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牟宗三在动荡的政局中，将政治化归为政治，学术化归于学术，不以政治理念干扰学术研究，也不以学术研究比附政治。当有人引用孙中山、蒋介石的言论报告《大学》时，他毫不客气，大加痛斥。他认为将学问与政治混在一起就是不尊重学问，学问的纯洁性和客观性就会受到污染，所以做学问要抛开一切，一心向学。^①他非常欣赏“赤条条来往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两语，对《水浒》中四无傍依，顶天立地的汉子更是一往情深，所以抛开一切世俗的牵累、纷争，专注于学问，最后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哲学生命合一，自然生命的延续就是文化生命的展开，哲学慧命的相续，牟宗三做到了。唐君毅感叹：读牟宗三的文章，是肉身成道；见他本人，又是道成肉身。^②肉身成道，道成肉身，此中人物，古今罕有。

二、彻法源底，实现儒道佛三家义理的相应了解；判教分明，会通儒道佛三家义理。

① 陈特《“学不厌，诲不倦”的楷模——我所认识的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纪念集》第309页。

②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2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2月版。

牟宗三以《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等有关篇章疏解原始儒学，以《才生与玄理》疏导魏晋玄学乃至原始道家，以《佛性与般若》（两大册）疏导隋唐佛学，以《心体与性体》（三巨册）与《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疏导宋明儒学，以一人之力，彻底疏解儒道佛三家义理在中国历史各期之展现，当今中国不敢作第二人想。在解析原始儒家中，他认为孔子是继往开来的大圣。他认为，中国文化由夏商周三代之演进，可视为现实文质累积，累积至周，方灿然明备，遂成周文。周文演进至孔子，已到了自觉反省，系统解析之时期。以形上之原理予周文之亲亲尊尊以形上之解析与超越之安顿是孔子之功。“现实的周文以及前此圣王之用心及积累，一经孔子戳破，乃统体是道。”^①

孔子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文化自伏羲画八卦在宇宙洪荒原始混沌中实现“灵光爆破”以来的生命之流，使“仁智合一”的文化由不自觉上升至自觉，同样他也为后世学者树立典范，作出了榜样。将孔子放到中国文化的生命之流中去界定其地位在近代中国也许不乏其人，但以仁智合一说明孔学的意义，以形上的解析和自觉的反省来论证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也许自牟宗三始。

牟宗三将孟子放到其所处的时代中加以考察，指出孟子在人的自然生命泛滥不见人的理性生命、精神生命的时代里肯定文化理想，凸显出一理性生命。孟子是由内在道德性而见于绝对主体性，复由此而直下通透绝对精神即天地精神。孟子建立了道德主体，而对知性主体与政治主体未予以充分注意。就人格形态说，孔子整个是一圆形，而孟则是一方形。孟子为把战国时代尽物量的精神压下去，从而要雄辩，要著迹，要露才，所以他全幅是英气，整个是棱角，这是孟子不同孔子处，也是其有功于圣门处。

^① 牟宗三《历史哲学》第9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8月九版。

与孟子树立起仁且智的道德主体不同，荀子则树立起了知性主体。他认为荀子的心是逻辑的心，理智的心，认识的心，而孟子的心则是道德的心，形上的心，或曰天心。由形上心、道德心成就主观精神，而由认知心、逻辑心成就客观精神。孔子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兼备，孟子凸显了主观精神，而荀子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则凸显了客观精神。虽说荀孟不同，但他认为荀子同样是由继承、发展孔子而来。中国文化由远古到孔子，由孔子到孟荀，是一不断开显的过程。他指出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仁智合一、重德性的文化系统，不过其初是不自觉的，经孔子之反省才将这一潜伏、不自觉的文化特征揭示出来，才表现为自觉的“仁智合一”的文化形态。孔子的贡献是将中国文化由不自觉提升到自觉。孟子则凸显了孔子的仁，荀子则凸显了孔子的智。在他看来，孟子与荀子表面对立，深层一致。孟子所建立的心性之体正是荀子“礼义之统”不可须臾而离的本源，而荀子所建立的“礼义之统”应是孟子仁义心性的客观实现。后儒尊孟抑荀，不能将中国文化表现的知性形态充分拓展与开发出来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以此角度论孔孟荀之义理进展，古往今来，牟宗三开其先河。

牟宗三对魏晋玄学名理予以系统疏解，他从王弼的易学革命谈起，中经王弼之注老，向秀、郭象之注庄，至阮籍、嵇康之名理终，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王弼一扫汉人象数易学之妖风，开出哲理解易之新途，牟宗三评论道：“王弼之功绩即在扭转此质实之心灵而为虚灵之玄思，扭转图画式的气化宇宙论而为纯玄理之形上学，此在思想上大进步也。”^①寥寥数语，王弼之易学地位清楚地显露出来。他评价王弼之老学亦甚精当，认为王弼对老子

①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144页。

“确有相应之心灵，故而独发玄宗，影响来者至钜。”^①牟宗三疏解王弼之注老，往往根据自身对老学的相应理解顺王弼注解之理路进而疏解之，在道家的义理进展中看王弼之义理得失，故常有高妙之论。对向秀、郭象之注庄，牟先生也作了相应的理解与发挥。他认为向、郭之贡献在于将《庄子》的诡辞为用之玄智模型发展为迹冥圆融。他说：“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的普遍原则，无为是本，是冥，是所以迹，而无不为是末，是迹。”而郭象之“即迹即冥，非迹非冥，斯乃玄智之圆唱，圣人之极致。”^②

这种迹本圆融将老庄推向了一新境界。他对阮籍、嵇康作比较研究，认为阮籍显情，为浪漫文人型；嵇康显理，为哲人型。“阮以气胜，嵇以理胜，同归老庄，而音制有异。”^③但他们都不及向、郭之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也。他认为嵇康、王弼、向秀、郭象皆有极高之哲学心灵。

最后，牟宗三以自由与道德对魏晋玄学作总体评价。他认为王弼、向秀、郭象之玄理是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对中国学术发展言，皆有其价值，然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时代风气言则造成了极大的流弊。其一是士大夫“祖尚浮虚”，其二是一般知识分子生活放荡，不守礼法，于是自然与名教即自由与道德发生了严重冲突。王弼之“名教出于自然”，郭象之“名教即自然”皆试图解决这一冲突，然而由于道家思想中“内在的道德性”不立，故而根本不能使二者达到真正的统一，以消融时代之冲突。

道家的“内在的道德性”不立，不向克服自然与名教即自由与道德冲突的路向上走，而是向非道德或超道德的自然无为之主体伸展，由此伸展所呈现出的自由是太阴教之自由，太阴即月亮，

①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127页。

② 同上书，第192页。

③ 同上书，第269页。